

简析《国语》散文创作的独特成就

黄永堂

《国语》是先秦时期三部历史名著之一,作为优秀的历史散文,是直接用当代语言就“事”说理的。这些“事”,有内政,有外交,有国事,有家事,天道、鬼神、地理、人事,应有尽有,可以说,它把春秋时代那些议论精详、形象生动的言论都记录了下来。这使它不但具有史学价值,而且因其以记“语”见长,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也有着独特的地位。

首先,《国语》就“事”说理,精采的记言,对后世的议论文,特别是战国诸子的议论文有直接的影响。

远在殷商时代就产生的誓诰已经就“事”说理,如《尚书·盘庚》记商第二十代君主盘庚为避免黄河水患,复兴国家,迁国都于殷,告谕臣民,极言迁都的好处,不迁的坏处。但压服式的君主命令,强制威胁的言词,只能把它称为应用文,实在没有多少文学的意味。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独立说理的议论文集是《论语》,它记录了作为教育家、思想家的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言行。但孔子对自己所主张的理,一般只有论点,论据大半没有列出,也没有进行反复的论证。这是因为他面对的基本上是自己的学生,既无论敌必须攻击,也很少有人与他辩论,说理只说了“其然”,很少或者没有说“其所以然”。从议论文的形式,可说是处于幼稚的阶段。在孔子以后,首先起来反对孔子和孔说的是墨翟,他非孔非儒,要从理论上击破孔学,建立自己的学说,不但要有观点,而且要有充实的论据,他创造了考、原、用的三种论证方法,逻辑谨严地证成自己的论点。《墨子》一书,虽和《论语》一样,由本门后学记录完成,但比之《论语》,在语录体说理文的写作上已经达到相当完整的高度。成书于战国初期的《国语》与《墨子》差不多同时,从广泛的语义上说,也相当于语录体散文,只不过不是一人或数人的语录,而是很多人的语录。它不象在前的《左传》和后来的《战国策》那样的史传文,是通过历史的记述和描写、对历史的褒贬来反映现实,而是直接对史事进行论辩,在论辩中反映现实。《左传》和《战国策》叙述历史的故事,往往有颇为复杂的情节,人物对话更多的是用以叙述事实、交流感情,当然也说清问题,但事为主,言为辅,言为事用。而《国语》对历史故事的叙述则十分简单,往往是简单交待事情的起因和最后的结果,重点在中间部分,即与这事件针锋相对的言论。这言论根据当时发生的事实,提出自己的观点。摆出充分的论据(这论据往往也包括那件具体的史实),进行逻辑谨严的论证,有时是反复的、多方面的、多角度的论证。言为主,事为次,事为言设。可以说,每篇文章,不管长短,它的中心人物的言论,都是一篇完整的说理文,论点、论据、论证三要素都已具备。比如仅有94字的短文《密康公母论小丑备物终必亡》,对三个美女同时奔就密康公的事实,他的母亲说明自己的观点:不能接纳,应献给周天子;然后用天子出猎击中三兽而不全部据为己有、诸侯的重大行动要与众人商议而定、天子娶女不娶同父所生的三个姐妹作事实论据,论证说明天子还不敢享用数量众多的美物,何况是小人物?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小人物享用美物,最终必定自取灭亡。长约2500字的《范蠡佐勾践灭吴》一文,叙写越国谋臣范蠡辅佐越王勾践灭吴的事迹。范蠡提出的“持盈”、“定倾”、“节事”的治国方略,是整篇言论的中心论点。开头勾践违背了“持盈”的方针,导致夫椒兵败,会稽蒙耻;后来听从了“定倾”的谋略,求和成功,转危为安;以后在

范蠡“节事”的方针指导下,越国休养生息,富国强兵,积蓄起打败吴国的实力,这是用正面事实证成论点。下面用穿插叙事,重点写吴越军队对待中范蠡的军事理论,用范蠡对话中吴国发生的人事变化、天道感应、天灾人祸造成的国力虚弱和民怨沸腾,说明吴王因为不明三个治国方略,最后导致亡身灭国,这是从反面证成其论点。

当然,《国语》中的人物通过谏言或对话议论说理,是就“事”说理,说理还是为事实服务的,不是独立的说理文,不象诸子散文的就“题”(某种思想哲学观点或政治主张)说理,说理是直接对“问题”进行辩论,引事是为说理服务的,已经是独立的说理文。但《国语》中利用言论的说理,已经有论点、论据和反复的论证,比之誓诰、《论语》,在说理文的形式和方法上,有了长足的进步。《国语》中,不少论事的篇章,如《祭公谏犬戎》、《邵公谏弭谤》、《虢文公谏不籍千亩》、《富辰谏襄王》、《单襄公论卻至佻天之功》、《展禽论祭爰居非政之宜》等等,在反复论证过程中,那种“言之有物,言之有序”的逻辑性很强的长篇大论,不满足于只是逻辑的说理,又藉助古人古事、古书古礼、今人今事、俗语俗礼等等作充分的论据,证成自己的论点。这种论辩手段,不但树立了观点,还塑造了历史人物的具体形象,在逻辑性之外,又增加了文学性。这一切,不能不说对后来的诸子文章,比如《孟子》那规模宏大的长篇大论,论辩过程中纵横捭阖、雄辩滔滔、言辞锋利,同时又不乏幽默诙谐或曲折尽情的说理;《荀子》散文的朴实厚重,说理的严谨绵密而且广征博引、取譬精警;《韩非子》文章的抉剔世情、深入隐微、巧喻善譬,等等,以及战国诸子文章中,那种对现实和历史的深刻认识,对人生哲理和自然天体的广泛探究,《国语》曾经或者应该有过积极的影响。而先秦时期,人们更注重散文的实用价值,也就是说文与史,或者说文与理还没有严格区分,《国语》和诸子散文就是一个明证。

第二,《国语》长于记历史人物的谏言和对话,语言古朴简洁,而议论时的旁征博引,对话中的巧譬善喻,却又能使文章理由充足,曲折尽情,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像《周语上·邵公谏弭谤》,全文仅256个字,除用数十字交待清楚前因后果外,主要是记西周政治家邵穆公对周厉王弭谤暴政的谏言,议论先是征引古代天子听言求治的事例来讽谏厉王,突出“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的正面论点;又用“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这客观存在的事实,来论证“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的观点,说明堵塞言路会断送国家前途,政治上的危险性切不可等闲视之。这段谏言,说理层层推进,有忠告,有警言,有理由,有办法,极富于逻辑性。用水比喻人民,形象贴切。水从表面上看来是很柔弱的,可是它的力量集合起来,可以冲决任何坚固的堤防。这些比喻富有说服力,成为后世治国理民的至理名言,千百年来一直闪耀着真理的光辉。再如《楚语下·蓝尹亶论吴将毙》篇,写楚令尹子西因为忧虑强盛的吴国会继续威胁楚国的安全,而在朝堂叹息,大夫蓝尹亶劝子西不要害怕表面强大的吴国,他拿吴王夫差“好罢民力以成私好,纵过而翳谏,一夕之宿,台榭陂池必成,六畜玩好必从”的行为,与其父亲阖庐生活俭朴、体恤民艰、礼贤下士、闻过则喜对比,断定今天的吴国已经不具备打败楚国的实力了,吴国是在由强向弱转化,而吴王夫差最终将搞垮自己,说明君子应该“临政思义”,修德才能治国的道理。

《国语》还有不少对话幽默风趣,口吻毕肖,颇能表现出人物的个性和精神面貌。《晋语四》写齐姜与子犯谋遣重耳,重耳酒醒后以戈逐子犯,说:“你们合伙把我弄走,将来事业不成功,看我不吃了你这当舅舅的肉(狐偃是重耳的舅父)”。狐偃边躲边嚷说:“事业不成,还不知我死在哪里,您怎么能与豺狼去争吃野地里的死尸呢?事业有成,晋国的一切鲜美食物您都吃不完,我狐偃这腥臊难咽的老肉,您哪会吃得进口呢?”幽默诙谐,妙趣横生,人物的精神面貌栩栩如生地跃然纸上。《晋语九·董叔欲为系援》,写晋国大夫董叔不听叔向的劝告,一心想通过联姻权

臣范氏来攀援富贵,后来被骄横的妻舅范献子抓来捆吊在树上,他求叔向说情,叔向幽默地将他原话中的“系”、“援”二字的意思变为被抓住和被捆吊,讽刺他想要的都得到了,攀富结贵的最终结果本来就是自取其辱。《叔向谏杀竖襄》里,老臣叔向正话反说,用晋的先祖唐叔射兕牛而封晋的故事,巧妙地对比出晋平公射雀不死还要杀人的无能,使平公悟出了话中的深意而赦免了小内侍。这种绝妙的劝谏方式,比起引经据典地说大道理,更容易让人接受,别有一种情趣,读起来也觉得更有文学意味。还有《赵简子欲有斗臣》等篇,叔向对答晋平公、董叔、赵简子那些话,滑稽诙谐,寥寥数语却满含机锋,人物个性刻划和精神面貌的揭示都是比较成功的。

第三,《国语》的记言,还表现在记行人辞令之美。行人,就是外交官。《周礼·秋官》有大行人和小行人,专掌朝觐聘问。《仪礼》有《聘礼》、《觐礼》篇,强调行人辞令的“辞无常,孙(逊)而说。辞多则史,少则不达;辞苟足以达,义之至也。”可见对朝觐聘问的辞,很早就特别考究。到了春秋时代,由于列国间交往频繁,外交重要,外交辞令当然也重要,这种行人辞令就更考究了。孔门列“言语”为“四科”之一,孔子曾称赞郑国外交辞令制定的严肃、经心、细致、考究,说郑国“为命”先由“裨谿草创之”,再由“世叔讨论之”,再经“行人子羽修饰之”,最后还要由执政者“东里子产润色之”。《楚语·王孙圉论之宝》特别提到楚大夫观射父“能作训辞,以行事于诸侯”,把他视作楚国的国宝。以上可见外交辞令的重要。特别是一些弱小国家或战败国家的“行人”,常常在外交场合凭借言辞来折服强国,正所谓“一言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灭国”,《左传》记载了不少这种出色的外交辞令,《国语》亦如此。如《吴语》中记公元前494年吴越夫椒之战,越王勾践兵败,退保都城会稽,危城中的勾践知道自己的力量暂时敌不过吴国,目前只能忍辱负重,就听从大臣文种的计谋,派大夫诸稽郢向吴国求和,作为缓兵之计。诸稽郢故意用卑下的言辞,向吴王夫差陈述吴国不应拒绝越国求和的理由。他把吴王兴兵伐越,轻描淡写地说成是入侵边境,而越国不记这种小怨,吴国不应再伐越;又说越国愿意用事奉天子之礼事吴,吴国没有理由再伐越;最后说越国本来就臣服吴国,吴国既已经扶植越国,如果出尔反尔,灭亡越国,将因小失大;失信于诸侯,“虽四方之诸侯,则何实以事吴?”一席外交辞令,表面卑下恭顺,实则绵里藏针,正因为其利用了吴王夫差骄傲自大的毛病和一心想北上中原称霸诸侯的野心,所以求和成功,为越国赢得了时间。再如《鲁语·展禽使乙喜以膏沫稿师》、《晋语·吕甥逆惠公于秦》等篇,都是在大兵压境,国势垂危的情况下,凭借外交辞令折服强国的,其态度的大义凛然,不卑不亢,言辞的正反捭阖,委婉动听,确实让人叹为观止。还有一些外交使节,他们在爱国心情的激励下,在外交场合,使出他们的聪明机智,辞令委婉巧妙,说理又很充分,而又带有感情,往往使对方无言可答,用外交辞令维护了国家的尊严。如《王孙圉论国之宝》篇,写在晋、楚两大强国的外交场合上,晋卿越简子最关心的是楚国的名玉,而楚国大夫王孙圉则认为在楚国被看作国宝的首先是人才,其次是对国家和人民有用的东西。他既驳斥了越简子把玩物当国宝的看法,保持了本国的尊严,又嘲笑了越简子“鸣玉以相”的骄奢浮华,见识浅陋,于此也就分出了二人的高下。其他象《鲁语·臧文仲如齐告籒》、《晋语·冀芮答秦穆公问》、《里克杀奚齐而秦立惠公》、《楚成王以周礼享重耳》、《秦伯享重耳以国君之礼》、《吴语·奚斯释言于齐》、《越语上下》都记述有不少精采的外交辞令。

第四,作为历史散文的《国语》,主要还是通过言论的记述,来记载那个时代重要政治人物的活动。但正如柳宗元批评《国语》所说:“尝读《国语》,病其文胜而言庞,好诡以反伦。”(《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务富文采,不顾事实,而盖之以诬怪,张之以阔诞。”柳宗元从历史角度批评《国语》的话,从反面证明了此书的文学性。正由于历史散文发展到了《左传》、《国语》时期,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象《春秋》那样“谨严”地记载历史,而是在真实地记述历史事件、人物言论的同

时,运用了文学想像和虚构,用丰富生动的语言,描绘人物性格,重在表现历史人物的精神风貌。如《王孙圉论国之宝》一文中,对晋国权臣越简子“鸣玉以相”的骄奢浮华,行事问话的骄横气焰,楚国外交官王孙圉在外交场合的机敏从容、侃侃而谈的气度,都有很出色的描写。再如《周语上》记厉王弭谤屠杀人民、纵容荣夷公摘专利;《晋语》记献公杀子、骊姬进谗、惠公争夺君权出卖国家利益;《楚语》记灵王建章华台、令尹子常蓄货聚马;《吴语》记吴王夫差好大喜功对外进行武力扩张、杀伍子胥等等,在一定程度上揭露和批判了统治阶级的腐败残暴、贪婪奢侈,鞭笞了统治阶级上层人物罪恶肮脏的灵魂。而对统治阶级中一些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具有爱国精神、美德美行的人物,则给予褒扬赞美,不惜浓墨重彩,表现他们崇高可贵的精神。例如在《鲁语》的《里革更书逐莒太子仆》、《里革断罟匡君》、《里革论君之过》等篇中,就生动地刻划了一个刚直不阿、维护原则,敢于“以死奋笔”、强行劝止君主恶行的直臣里革的形象。而在《越语》中,对于发奋图强、任贤用能、励精图治、报仇雪恨的贤君勾践、有杰出外交才能的文种、军事和政治天才范蠡也都有很出色的描写。特别是《越语下》,通篇记范蠡佐勾践灭吴,写越王勾践不用与用范蠡的三个治国方略,造成的失败与导致的成功,从正反两方面突出范蠡的治乱长才。当越国经过“十年生聚”,积蓄了打败吴国的实力,勾践报仇心切,范蠡四次劝他等待天时人事的变化,等待时机成熟,表现出范蠡的深谋远虑、诡诈多智;起兵伐吴,范蠡论战,表现出范蠡卓越的军事才能;吴人兵败求和,范蠡不为所动,坚持穷寇猛追,不留后患,表现范蠡的政治远见;灭吴后功成身退,泛舟五湖,表现范蠡顺应自然的道家思想。通篇叙写范蠡,可以说是我国历史著作中,最早的用记“言”的形式留下来的名臣录之一。其他如《齐语》记管仲、齐桓公;《鲁语》记展禽、里革、臧文仲、季文子、公父文伯之母;《晋语》记晋文公、越衰、赵盾、晋悼公、叔向、魏绛、赵文子、范文子、叔向;《吴语》、《越语》记伍子胥、范蠡、文种、勾践等等。都是用记“言”的形式记载政治活动,表现作者的是非观念和爱憎分明的态度。刻划人物形象,表现历史人物的精神风貌。这也是《国语》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的独特贡献。

第五,《国语》虽然叙事少,但篇章完整,不少故事情节生动,有头有尾,对人物性格也有较细致的刻划,可以单独成为一个个文学短篇。比如《晋语》的献公杀子,写优施与骊姬合谋陷害太子申生,先写优施教骊姬怎样掌握申生“小心精洁,而大志重,又不忍人”的性格特点,要她采取对申生进行人格上的污辱诽谤的办法,因为像申生这样立身行事小心谨慎,洁身自爱又自视甚高的正人君子是受不了侮辱的,又不忍心对人有恶意,只能忍心对自己。后来骊姬果然用弑父弑君的大罪名诬陷申生,逼他自杀。这种含心理分析的描写,在其他历史散文中还是少见的。尤其写优施争取大夫里克,使他不助申生,利用里克性格软弱,又拿不定主意的弱点,以俳优的身份在酒宴上起舞,唱《暇豫之歌》暗示里克站在申生一边将对对自己不利,后面写:

优施出,里克辟莫,不殄而寝。夜半,召优施,曰:“曩而言戏乎?抑有所闻之乎?”曰:“然。君既许骊姬杀太子而立奚齐,谋既成矣。”里克曰:“吾秉君以杀太子,吾不忍。通复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优施曰:“免。”

描写生动,对话精炼,凸现出人物的性格特点。这种柳宗元攻击的“文胜而言庞,好诡以反伦”,“务富文采,不顾事实”的文学性描写,《国语》中不少篇章都有。如《晋语九·史黯谏赵简子田于嬖》,写赵简子到国君的嬖苑打猎,史黯听到后,就牵了一条狗守在园门口,也说自己打算进园打猎,用这种上行下效的方法,巧妙地劝谏赵简子要以身作则,实在很富于戏剧性。而《閻没叔宽谏魏献子无受贿》中,写晋国大夫閻没、叔宽讲究了劝谏的方式方法,借吃饭一事说明人不能贪心不足,劝谏执政卿魏献子不要受贿,结果达到了目的。而文中“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句话,演变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成语流传千古,可见原文的形象生动、引喻的

恰切。其他象《叔向谏杀竖襄》、《董叔欲为系援》、《铁之战赵简子等三人夸功》、《赵文子为室张老谓应从礼》等等，都是一些精采的文学短篇。

另外，《国语》偶尔也有盛大的场面描写，如《吴语·吴晋争长夫差陈兵而得为盟主》篇，写诸侯各国在黄池会盟，吴晋两国争当盟主久而未决，夫差的老对头越王勾践趁机袭击吴国，进兵姑苏，杀吴太子友，又沿淮河陈兵断绝吴王夫差的归路。重兵深入中原的吴王夫差，远离本国，听到后院起火，情势不利，只好听从大夫王孙雒的计谋，孤注一掷，以兵势威胁晋国以求速决。吴王夫差黄昏时就下令厉兵秣马，夜半时让将士全副武装，列队布阵，一百个士兵为一行，一百行共一万士兵组成一个方阵，中间的方阵“皆白裳、白旗、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王亲秉钺，载白旗以中阵而立。左军亦如之，皆赤裳、赤旗、丹甲、朱羽之矰，望之如火。右军亦如之，皆玄裳、玄旗、黑甲、乌羽之矰，望之如墨。”这披袍带甲三万士兵组成的三个方阵，中间像一片盛开的白茅草花，左边像熊熊燃烧的火海，右边像一派墨黑的汪洋，色泽浓丽，对比鲜明，何能壮观。这三万人组成的军队逼近晋军营寨，在天明时突然金鼓齐鸣，三军将士大声呐喊吼叫，作出进攻的姿态，造成强大的声势，如火如荼，惊天动地，晋军果然吓得坚守不出。晋国君臣虽然明知吴男有大忧，吴王才如此虚张声势，但也不愿攫其锋头而受害，吴王夫差终于如愿以偿，先歃血当了盟主。这段描写，作者不惜笔墨，极力渲染气氛，写得有声有色，耀眼夺目，十分精彩，同时对比揭示出吴王夫差强大兵威下惨痛的内心。就内容而论，揭示吴王的外强中干、色厉内荏，自有内涵；就语句而言，整齐、重复中见变化，写得来壮观精彩，淋漓尽致。这些文学描写继承了《左传》写作历史著作的优秀传统，即历史著作应该同时具备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历史著作应该有强烈的倾向性，同时又应有文采，倾向性应该通过有文采的描述表现出来，以感染读者。《国语》不少篇章，已经初步具有后世传记文学和历史小说的基本特色，表现出历史散文在文学上进展的痕迹。

(作者单位：贵州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李建国]

(上接第74页)

之名，起自孟坚，但指一事。魏杜挚《赠母丘俭》，叠用八古人名，堆垛寡变。太冲题实因班，体亦本杜。”

⑨《岳书·颜延年传》：“颜延年领步兵，好酒踈诞，不能斟酌当时。刘湛言于彭城王义康。出为永嘉太守。延年甚怨愤，乃作《五君咏》。”

⑩卢藏用《陈氏别传》。

⑪韩愈《送董邵南序》。

⑫陈子昂《谏政理书》。

⑬《读通鉴论》卷二一。

⑭白居易《采诗以补察时政》。

⑮《瀛奎律髓·怀古类》小序：“怀古诗，见古迹思古人。其事无他，兴亡贤愚而已。”

⑯刘学锴《李商隐的咏史诗的主要特征及其对古代咏史诗的发展》，《文学遗产》1993，1。

⑰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后世创作怀古、咏史出现了交融现实，杜甫《蜀相》，从题目上看是咏史，从内容上看似有一定怀古成份，黄滔《严陵钓台》：“终

向烟霞作野夫，一竿竹不换簪裾。直钩犹遂熊罴起，独是先生真钓鱼。”从题目看是怀古，从内容看是咏史。也有既可为咏史又可为怀古的作品存在。所以人从类上说，怀古诗应该归入咏史一类。

⑱《义门读书说·杜工部集》。

⑲这里需要加以说明的是，咏史诗的发展有一特殊现象，即一种新体的兴起并未完全取代旧体，而呈现出各体纷陈的局面。如班固开创的“述史”体咏史诗，在历经千年的发展，继作者代代不绝，晚唐胡曾就大量创作了这种“述史”体的咏史诗。（参见拙文《略论唐代咏史诗的美学追求》，见《诗赋论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2月版）。

⑳李商隐《无题》。

㉑《经吴官》。

㉒《春望梁石头城》。

㉓《隋堤》。

㉔魏征《谏太宗十思疏》。